

我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从当时的视角来看，好事、坏事我都干过。既当过『保皇派』，也做过『造反派』；既挨过别人的批判，也批判过别人；既戴过高帽子、坐过『喷气式飞机』，被软禁过，也参与审查过别人；既参与写过《炮轰云南省委》的大字报，也写过反康生的大字报；既参与过串联、造反、游行、静坐，也为解放老干部而做了不懈的努力。我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过，也为知青函授教育而奔走于安庆各地。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事情，我几乎都经历过。

我不仅是高校的教员，也是所谓的『高干子弟』。由于我的身份特殊，所以接触高层领导的机会就多一些，了解的情况也多一些。尽管我写这本回忆录十分艰难而又辛苦，但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更不要重演历史悲剧，我愿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闻、所见和亲身经历的事写出来，以供后人借鉴。

我写这部回忆录的原则是：用事实说话，客观地真实地再现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写出我当时所思、所为，力求写出一个真实的我。



难忘的非常岁月

难忘的非常岁月

陈瑞生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难忘的非常岁月/陈瑞生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098-2067-4

I. ①难… II. ①陈… III. ①陈瑞生—自传
IV. ①K825.46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6487 号

责任编辑:王 兵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240mm 1/16

字 数:222 千字

印 张:15.25

印 数:1—4000 册

版 次: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2067-4

定 价:26.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3072533

前言

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三十多年了，但是，它给我的影响和记忆却始终挥之不去。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力图忘记那十年浩劫对我全家人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伤害。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日子。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总会在我脑海中时隐时现。这就是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动因。

我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从当时的视角来看，好事、坏事我都干过。既当过“保皇派”（保守派），也做过“造反派”；既挨过别人的批判，也批判过别人；既戴过高帽子、坐过“喷气式飞机”，被软禁过，也参与审查过别人；既参与写过《炮轰云南省委》的大字报，也写过反康生的大字报；既参与过串联、造反、游行、静坐，也为解放老干部而做了不懈的努力。我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过，也为知青函授教育而奔走于安庆各地。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事情，我几乎都经历过。

我不仅是高校的教员，也是所谓的“高干子弟”。由于我的身份特殊，所以接触高层领导的机会就多一些，了解的情况也多一些。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是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尽管我写这本“文化大革命”回忆录十分艰难而又辛苦，但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更不要重演“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我不顾古稀之年的劳累，愿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闻、所见和亲身经历的事写出来，以供后人借鉴。

我写这部回忆录的原则是：用事实说话，客观地真实地再现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写出我当时所思、所为，力求写出一个真实的我。我愿坦荡地直面人生，决不会文过饰非，更不会嫁祸于人。

由于相隔时间久远，从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算起，迄今已有42年之久，加之我没有留下当年任何的个人文字资料，对许多事情已记忆模糊。但是本书所涉及的重大事件和活动所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一些数据，我均到图书馆查阅过当年的报刊和参阅过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籍，认真地进行过校正。需要声明的是，这本回忆录，在细节上仍然难免有误。为了使这本“文化大革命”回忆录能更加真实可信，我将书稿分别请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年的老同事们帮我审阅校正过，同时也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在此，对于审阅过本书书稿的同志以及当年的报刊和参阅书的作者一并表示深切谢忱！

陈瑞生

2013年3月

| 第一章 |

“元梓弹”的爆炸波及神州大地 · 1

| 第二章 |

戴高帽子陪“黑帮”游街示众 · 12

| 第三章 |

参加红卫兵大串联 · 24

| 第四章 |

群众组织兴起，山头林立、武斗成风 · 47

| 第五章 |

搞“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个人迷信登峰造极 · 61

| 第六章 |

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保护领导干部 · 71

| 第七章 |

写反康生的大字报险些蹲大牢 · 78

| 第八章 |

“文化大革命”烈火开始烧到我父母 · 84

| 第九章 |

搬家疏散，天各一方 · 96

| 第十章 |

实行紧急战备疏散 · 106

| 第十一章 |

押运货车到合肥，护送伤病员回北京 · 116

| 第十二章 |

在中国科大“五七”干校的日子里·127

| 第十三章 |

到政法学院的“五七”干校参加整党·142

| 第十四章 |

父亲在写检查中含冤去世·150

| 第十五章 |

陪母亲到南方旧地重游·165

- (一) 父亲突然去世，母亲悲痛欲绝·165
- (二) 在杭州受到了谭启龙的热情接待·167
- (三) 母亲重访第二故乡·168
- (四) 重访江西第一站庐山·171
- (五) 重访革命摇篮井冈山·173
- (六) 回父亲的故乡遂川·183
- (七) 母亲的瑞金情结·184
- (八) 兴国山歌记心怀·187
- (九) 萍乡群众目睹老革命·188
- (十) 母亲回到第一故乡湖南·189
- (十一) 在南昌访亲问友叙友情·193
- (十二) 到芜湖拜访战友王恩茂·198
- (十三) 合肥小住心舒畅·200

| 第十六章 |

难忘的1976年·203

- (一) 周恩来总理逝世·204
- (二) 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210
- (三) 朱德委员长逝世·215
- (四) 唐山大地震·221
- (五) 突然降临在我头上的政治批判·224
- (六) 毛泽东主席逝世·231
- (七) 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234

| 后 记 | · 237

第一章

“元梓弹”的爆炸波及神州大地

公元1966年6月1日的傍晚，中国人按照自己多年的政治生活习惯，普遍都喜欢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间新闻联播。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电台开始曲响过之后，“元梓弹”的爆炸声突然在神州大地的上空发出一阵巨响！这颗“元梓弹”的当量远远超过当年美国在日本的长崎和广岛投下的原子弹。

但是，当听到“元梓弹”的爆炸声后，中国人并没有像当年的日本人那样发出尖叫声或狂奔的悲惨景象，而是静悄悄地侧耳聆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播放的这篇广播稿，其内容，其声调，都非常令人震惊！我当时的感受，是一生从来没有过的。我作为一个大学的政治理论教员，深感这篇广播稿必将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产生重大的影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这篇稿子，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党总支书记聂元梓联合六名教师，于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珏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



贴于北大校园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副部长；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珉云，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后来，我才知道，这篇大字报得到康生夫人曹轶欧的支持。大字报经康生抄寄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毛泽东大力称赞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呀”，并将之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第二天，我在《人民日报》头版上看到了全文刊载的这篇大字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攻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批判他们实行的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发誓“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由王力、关锋、曹轶欧等合写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公然污蔑北京大学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这种荒谬的论点，为后来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制造了依据。

我是北京大学哲学系1962年毕业的学生。对于这张大字报的七位作者，我几乎都认识，其中有一位还是我的同班同学。当时，我虽然预感到这张大字报的分量，但我决没有预计到这份大字报对于拉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所产生的巨大作用。

当时，我是北京政法学院哲学教研室的教员。1966年的春天，北京政法学院为了贯彻中央关于教育革命的双轨制方针，决定由院党委副书记郭迪、团委书记苏秉坤带队到北京市大兴县天堂河农场去搞半工半读的试点工作。我记得去的学生只有政法系一年级的六个班。我们哲学教研室由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吕国珍牵头，配了三个教员，即凌力学、罗子桂和我。

天堂河农场根本不具备教学的条件，既没有教室和礼堂，也没有供师生居住的宿舍，更不可能有什么图书馆。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只好分散居住在农民家里。后来，我们在没有工程师指导的情况下，土法上马，盖了一个简易的食堂兼礼堂。我是盖这个建筑物的瓦工之一。

在天堂河农场，我们的劳动任务是种水稻。在播种和插秧之前，首先是和学生一起，到干涸的湖底挖淤泥，用独轮车推到稻田里做肥料。郭迪和我们师生一起参加积肥的劳动。以后，又一起参加插秧的劳动。

至于我们教员备课，那就更为困难，既没有什么参考书，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办公桌。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写出什么像样的讲义来。为此，我们编写了一些结合农村的生产劳动和农民的生活习俗的通俗哲学教材，在哲学的通俗化和应用上下功夫，以增强哲学教材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同时，也鼓励学生应用哲学原理结合生产和生活实际去编写一些哲学小故事，并以此作为他们学习哲学的心得体会。

5月份，我们教职员工，分期分批返城休息。我是最



聂元梓在向北京高校学生作演讲



作者（右一）和父亲陈正人（右二）、母亲彭儒（左四）在北京万寿路10号家中合影

后一批回家休息的教员。

那时，虽然我已结婚了，而且已有一个两岁的女儿，但北京政法学院并没有给我分配房子。于是，我们一家三口人只好和父母亲挤在一起住。我父亲陈正人时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务院农业机械工业部部长，住在北京万寿路10号。

5月31日，我从大兴县天堂河农场回到万寿路的家里。本来，我起码可以休息十天。没有料到6月1日晚，忽然收听到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2号又看到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这些都使我坐立不安，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深感聂元梓大字报的播出，决不是一件小事，非常可能引起社会公众的巨大反响。我思来想去，还是决定骑自行车到学校去看个究竟。

我一到北京政法学院，立马看到一片热火朝天的局面。不大的校园，人声鼎沸！在礼堂门口的上方挂了一条“热烈支持和声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横幅标语。

接着，人们纷纷涌进礼堂。究竟是哪一个单位、是什么人组织这个大会，我一概不知。

礼堂里拥挤不堪，秩序十分混乱。我站在礼堂的后面，想看个究竟。礼

堂的舞台上，有一张桌子，还摆了一个立式麦克风。我没有看到有谁在主持会议，似乎一切都是自发的、无序地在进行。

突然，有一个青年学生跳上讲台，对准麦克风，声嘶力竭地说：

“我认为，北京政法学院党委是三家村黑店的一个分店！”这句话犹如一声炸雷，轰动整个礼堂。

他正要往下罗织党委的罪状时，很快就被学生会和团委的学生干部推下舞台，并且把他推到礼堂外面，进行围攻和辩论。

但是，也有一部分学生说，还是让他把话讲完吧！于是，又把他架上舞台，让他继续讲下去。小小的礼堂，一会儿安静，一会儿混乱。我记得他一连讲了七八条，指责“北京政法学院是三家村黑店的一个分店”。总之，把政法学院党委说得一无是处。其措词十分尖锐，使我感到极为震惊！

当时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是刘镜西，副院长是李进宝、郭伦、朱寄云，副书记是郭迪、鲁直等同志。开声援大会时，我没有看见任何一个院领导在场。

此时，会场秩序非常混乱！那个学生讲完后，许多学生跳上舞台抢麦克风要发言，驳斥那个学生的观点。这种场面，我从未见过。这时，学生会的干部站出来维持秩序，他们要大家安静，一个一个发言。

接着，礼堂秩序逐渐趋于安静，按照递的条子先后顺序依次发言。一上午的发言，绝大多数都是驳斥那个学生的发言，维护党委的威信。但也有人支持他的发言。

我一直站在礼堂的后面，听完了所有学生的发言。与会的教职员工都十分谨慎，没有一个人上台发言。

时间已经临近吃午饭了，但要求发言的人仍然非常踊跃。一个临时主持会议的学生会干部宣布休会，要求吃完午饭后，再来礼堂开会。

中午休息的时间很短，大家又自发地云集礼堂。没有多久，礼堂又坐满了人，而且仍然有许多人站着。我还是站在礼堂的后面。

下午发言的秩序比上午好些，情绪也没有上午那么激昂了。但没有多久，又有一个学生跳上讲台，为上午那个学生辩护。他严厉地指责了北京政

法学院党委压制群众，抵制“文化大革命”。其措词比上午那个学生更为激烈。接着，赞成和支持这个学生发言的人越来越多。而维护党委发言的人则越来越少。上午的发言基本上是一边倒，而下午的发言则充满辩论的气氛。

我记得大会快要结束时，形成了一封《热烈支持和声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的声援信》，并在会上念了一遍。

散会后，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一方面，我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一直是非常信任的。因为它们是党的喉舌，是传达党中央的声音的。我作为195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从来都是听党的话的，只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重要文章和《人民日报》刊登的重要文章，我都是深信不疑的。多年以来，在“驯服工具”思想的熏陶下，我不可能去怀疑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但是，另一方面，我看到那么多学生跳上礼堂讲台，肆无忌惮地攻击和漫骂北京政法学院的党委。看到这种情景，我立刻想到了当年的反右派斗争。对于这种严重的阶级斗争状况，我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觉。因此，在这一天，我一直保持沉默和中立的状态。

但有一个问题我感到疑惑不解。

在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以前，曾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中共中央下发的“五一六通知”，这两篇东西虽然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定关注，但绝没有像这张大字报那样产生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这个轰动效应，的确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其冲击波，辐射到全国各地。6月2日，全国的高校几乎都同北京政法学院一样，热烈欢呼和支持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并把攻击的矛头对准本校的党委。在我党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次政治运动能像这次“文化大革命”这样，在一天之内没有任何人做动员报告，就像火山爆发一样自发地发动起来了。从这天起，几乎全国所有的大专院校都“踢开党委闹革命”，其声势，犹如钱塘江大潮一样汹涌澎湃，势不可挡！

散会后，我骑着一辆破旧的飞鸽牌自行车回到万寿路家里。一路上，我想了好多，头脑里充满着许多疑问。

回到家里，我很想把这一天在学校里的所闻所见告诉父亲，并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有关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信息。但等了很久，他一直在八机部上班还没有回家。其实，我也知道，要想从父亲那里得到未公开的有关中央的信息，是不大可能的。父亲是一个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他一生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并以此不断地教育我们这些子女，“不该说的话不要说，不该打听的事不要打听，不该自己看的文件不要看”。



作者的父亲陈正人

我一直等到晚上十点钟，父亲还是没有回家。于是，我只好睡觉了。但我已决定不休假了，明天吃完早饭就回大兴县天堂河农场。

其实，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我当初干嘛那么积极呢？既然学校轮流要我倒休十天，我何必那么早就回去呢？可是，任何事情都是此一时彼一时。就我当时那种“政治觉悟”，或者说“不可理喻的傻气”，我必然会做出那种决定。

第二天，我告别了家人，乘公共汽车回到了天堂河农场。

哲学教学组的同志问我是否到学校去了，我说去了。并且把我在6月2日的所见所闻给他们讲了一遍。他们听后，都感到十分惊讶，也感到形势十分严峻，心里十分茫然。同时，他们也告诉我，在天堂河的学生也闹起来了，在小礼堂贴了许多的大字报，攻击的矛头直指院党委。

下午，我到我们亲手建造的小礼堂去看大字报。大字报像墙纸似的，把礼堂的里里外外贴满了。其中有一张炮轰院党委的大字报，内容很长，而且有许多学生上面签了名。签名中，我看到一个很熟悉的学生的名字。因为

他父亲和我父亲是老同事，而且我们两家人都住过东四的灯草胡同。两家的孩子经常会在一起玩，如同亲兄弟一样。当然，我的年龄比他们大得多，而且经历也比他们丰富得多。我既是这个学生的老师，也是他的大哥。在这混乱的局面下，别的学生如何行动，我可以不管那么多，但对这个我们平时称之为“老二”的小老弟，我是必须向他提个醒儿的。

我特意把“老二”找来，我们一起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这张长长的大字报。

我问他：“这个名字是你自己签的吗？”

他明确地回答我：“是呀！”

我把他拉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对他说：“这张大字报如此恶毒地攻击了院党委，你就不怕将来被打成右派分子吗？你这样做，知道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吗？你怎么对得起你爸爸！”

然后，我语重心长地告诉他，1957年“右派分子”如何“进攻”党，党又如何掀起一场反右派斗争，把那些帮助党整风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团籍，开除公职，发配到农村和边疆去劳动改造，把一生的政治前途全葬送完了。最后，我对他说，对于当年“右派分子”这种惨痛的教训，我们可要认真吸取啊！

“老二”听我这么一讲，感到有些紧张，很快就悄悄地把自己的名字抠掉了。

我对“老二”讲的这番话，实际上是我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态度和认识。对于学生如此肆无忌惮地攻击和漫骂院党委，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认同。我认为，任何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共产党员都不会允许有人如此恶毒地攻击党委及其领导。但是，作为党的喉舌的《人民日报》又是那样旗帜鲜明地支持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尽管心里有以上这些想法，但在行动上仍处于一种观望状态。

回到天堂河没有几天，学校就通知我们在天堂河搞半工半读试点的全体师生员工回到北京政法学院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接到通知后，我们打好行李准备返城。但是，我们都估计不到是暂时回

城里还是再也不回天堂河来了。起码我本人是没有打算不回来了。因此，我还有一些东西就撂在天堂河了，此后一直没有机会去拿回来。

学校派了许多的大轿车和大卡车，把我们拉回城里去。我们一个个把行李往大卡车上扔，然后上大轿车。老师和学生是混合坐车的。这时的学生和我们老师之间的关系仍然像往常一样亲密无间，学生们都把好位置让给我们坐，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煞是热闹。

因为要回学校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在回校的路上，几乎是一路春风一路歌，那时候的歌曲基本上都是老中青会唱的一些老歌曲。什么“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社会主义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洪湖水浪打浪”、“祖国颂”、“打靶归来”……总之，大家高兴地一个接一个唱就是了。在车上，天堂河这批同我们朝夕相处的学生，和我们的关系确实非常融洽，没有显示出任何疏远和敌意。可以说，大多数学生我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其中有一个班的班长叫史振胜，直到今天我都很怀念他。因为他是一个纯朴正直、憨厚老实、品德端正的青年。粉碎“四人帮”后，他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又一次成为我的学生。他的妻子和孩子来党校看望他时，我就让他们住在我的家里。1982年夏，我去敦煌参加美学培训班，路过兰州时，我到甘肃省委党校去看望他，才得知他因病去世了。当时，我的心情是十分难过的。

当我们的汽车过了北太平庄时，政法学院的教学楼立即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大家高兴得几乎要站起来了。但对于我们这些教师来讲，我们的心情毕竟同青年学生不同。我们不少教师，特别是那些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心情都略显得有些沉重。因为我们很难料到，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

汽车从简陋的北门开进了校园，马路的两旁站了许多人。当汽车停稳后，我们一个接一个地下了汽车。

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郭迪、苏秉坤、吕国珍等领导同志，一个个双手被倒剪、脖子被学生的手摁着推上礼堂的舞台。然后，政治辅导员和政治理论教员也被学生推上了舞台。我们一个个头被两个学生的手摁着，双手反剪翘在后面，其姿式如同喷气式飞机。

说实话，我一下子被吓懵了，脑子一片空白。他们批判什么，说什么，我一概听不清。我只听见群情激愤的口号声：

“打倒黑帮分子！”

“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打倒反动学术权威！”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

……

这个会，看起来倒像是个批斗会，但批谁，批什么，好像毫无准备。我们这些坐“喷气式”弯腰站在舞台上的人，除了党委副书记郭迪和团委书记苏秉坤之外，没有一个是分量的人。而他们两人虽然算是天堂河半工半读试点工作的领导，但成天到晚都和学生一起摸爬滚打，在一块参加体力劳动。除此以外，造反派们还能了解什么？

其实这个看起来气势汹汹的批斗会，无非是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扫扫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威风，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组织大会的主持人很快就宣布散会，然后大声喝令道：“你们都滚回去！好好想想自己的问题吧！”

虽然批斗会的时间很短，但是我们一个个都坐了“喷气式”，在舞台上站了40多分钟。我们每一个挨批斗的人，都弄得汗流浹背，搞得灰头土脸，往日的尊严被扫得一干二净。

我们灰溜溜地从礼堂走出来，由后勤人员带我们到卡车上找自己的行李。我和罗子桂找着自己的行李回到六号楼往日住的213号房间。

我首先到洗脸间去洗了洗脸。然后，回到房间打开行李铺好床，躺在床上休息。在北京政法学院工作的教员，不管你是否成家，都是两个人住一间房，既是办公室，也是我们睡觉的宿舍。当时，我和罗子桂同住一间房。多年来，我们都这样生活和工作。我们哲学教研室的教员和学生一样，只允许在星期六回家，星期日晚上再回来，最晚也必须在星期一早上八点钟前回学校。